

# 智能资本化与资本智能化<sup>〔\*〕</sup>

李爱龙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在资本逻辑的范围内,人工智能繁荣发展的表象背后潜藏着深层次的“危机”——资本与人工智能的“共谋”。首先,这一“共谋”表现为智能资本化。作为工具的高级形态,人工智能是人类建构自身存在方式的重要媒介,但是资本的介入使其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进步,成为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自主结构,成为吸纳和榨取人类精神劳动力的存储器。其次,这一“共谋”表现为资本智能化。资本智能化开启了资本权力从肉体规训到精神物化的范式转换,不仅在生产领域剥夺了工人的精神劳动,而且在消费领域制造了自由解放的幻象,从而将整个社会生活“去革命化”。第三,这一“共谋”是社会分裂的加速器。作为资本权力布展的结果,“无用的大众”陷于深度异化之中,他们不仅丧失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沉浸于虚假需要的智能幻象,最终变成了智能社会中的“赤裸生命”。

〔关键词〕人工智能;资本;自主结构;精神物化;“无用的大众”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08

当下,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就像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机器体系将“体能”自动化,人工智能则将“智能”自动化。然而,人工智能繁荣发展的表象下掩藏的是深重的“危机”。控制论专家维纳指出,机器体系“通过引入机械装置的竞争导致了人类手臂的贬值”,而人工智能“将会引起人类大脑的贬值,至少会引起人类大脑在更简单、更常规化的决策方面的贬值”。<sup>〔1〕</sup>扎卡达基斯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机器体系的运用威胁到了“蓝领”雇佣工人,那么,人工智能的运用则威胁到了

“那些高收入、专家式的白领工人”。<sup>〔2〕</sup>可见,生产工艺的革命在带来生产力巨大飞跃的同时,也使工人成为自动化体系的附属物。对此,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对“物”持有悲观或乐观的态度,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物象化”的社会关系。由此,面对蓝领工人打砸机器的“卢德主义”,马克思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sup>〔3〕</sup>。而面对白领工人反对人工智能的“新卢德主义”,我们同样强调,不是人工智能而是其资

作者简介:李爱龙,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生命政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18ZDA015)的阶段性成果。

本主义应用将白领工人置于“无用”的境地。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当代人工智能革命展开批判性分析,揭露资本与人工智能的“共谋”机制,从而激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 一、资本化智能的自主结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建构自己存在方式的重要媒介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sup>[4]</sup>而区分不同物质生产方式的标准就在于不同的劳动资料。“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sup>[5]</sup>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资料实现了从工具到自动化机器体系的飞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sup>[6]</sup>借用海德格爾的话来说,工具是工人的“上手”之物,而生产就是工人的“操劳”,它体现的是工人的主体性。因此,工人是生产过程的主人,他通过自己的“器官”直接同外部世界打交道。通过具体的生产过程,工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工具—外部世界”的意义结构,为自己敞开了—条追问存在意义的道路。

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种田园诗般的宁静。马克思曾对机器体系有过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机械怪物”“能工巧匠”和“工业君主”。首先,“机械怪物”意味着机器体系超出了人类体能的自然限制,“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其次,“能工巧匠”意味着机器体系褫夺了工人的技艺,“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sup>[7]</sup>。第三,“工业君主”意味着工人要学会像机器一样思考,成为机器体系的奴仆和随从。因

此,机器体系将生产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中解放出来,它以“轻易、精确和迅速”替代了工人的“肌肉”和“双手”。由此,对于工人而言,机器体系不具有“上手性”,而是难以抗拒的“铁人”;生产过程不再是“操劳”,而是机械性的“操作”;工人在生产中感受到的不是主体性,而是备受机器体系摆布的屈辱感。由此,工人与外部世界的意义结构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机器体系中介了的“生产世界”。

通过这三个比喻,马克思意在揭露的是,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作为工具的高级形态,机器体系的使命就在于将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人类个性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而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机器体系这一“死机构”褫夺了工人的主体性,逐渐获得了人格化的表征和支配一切的专制性。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权力、刑罚以及饥饿的重压下人们才逐渐养成了对机器体系之绝对命令的习惯性服从。与之相反,人工智能在其使用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遇到或者伴随着工人的血泪史。这就意味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揭露人工智能的存在意义及其资本化所隐含的支配性逻辑,进而破解人工智能语境下人之存在的“斯芬克斯之谜”,是十分必要的。

与机器体系将人类体能自动化不同,人工智能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实现了人类智能的自动化。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逐渐摆脱笨重的物质载体,逐渐挣脱繁重的物质生产的束缚,其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图像化、虚拟性的特征。就像意识在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中获得独立形态一样,作为人类智能的物化,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具备某种意识形态属性,它充分展示了人类精神劳动力的主体性。因此,人工智能营造的是一个后工业化的“生活世界”,不像机器体系那样营造的是一个工业化的“生产世界”。在这种“生活世界”中,人们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无力、笨拙和屈辱,而是一种本质力量的解放。由此来看,人工智能不再仅仅具

有机器体系一般的人格化表征,而是更进一步地,它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主体”的资格。对待人工智能,人们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操作”,而是折回到“操劳”,试图在人工智能的范围内敞开一个“意义世界”。由此,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人工智能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人们对本真生活的渴求。

然而,在资本逻辑的支配范围内,人工智能成为资本化智能,成为资本吸纳和榨取人类精神生产力的无形存储器。如果说机器体系促成了人类物质生产力实现从形式从属资本到实质从属资本的质变,那么,人类精神生产力实现这一质变所依靠的则是人工智能。在机器体系中,人们的精神能够超出物质载体的束缚,而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激起精神创造的支点却是资本。在资本无限制的增殖欲望以及无止境的普遍性趋势的催逼下,人类精神生产力正在被掠夺性开发,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进步。

由此,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瞬时性、符号性以及超现实性的特点,越来越超出人类理智所能理解的范围而成为自主性的客体结构,越来越脱离人类文明的基础而变成资本逻辑新树立起来的“非神圣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生活世界”就变成了图像的世界,布满了瞬息万变的虚拟图像的叠影,“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sup>[8]</sup>。“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sup>[9]</sup>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智能手机。作为一切智能技术的终端,手机的更迭换代逐渐抛弃了使用价值而追求博人眼球的晕眩外观与超验参数。正如德国当代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所指出的,社会加速催生了“新异化”——“人们自愿去做他们不‘真的’想做的事”<sup>[10]</sup>。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的三个比喻来类比人工智能的资本化或资本化智能。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三个比喻提供了

一个理解当代人工智能革命的“问题式”,有助于剖析资本化智能座架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智能怪物”的比喻。首先,这一比喻意味着人工智能在计算、记忆、观察等能力方面超出了人类智能的诸多自然限制,它完全不受脑力疲劳以及主观情绪的影响,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长时间地高速运转。更进一步地,这一比喻意味着人工智能的资本化面相使这些优于人类智能的诸多方面变成了抽象的、歪曲的以及形而上学化了的绝对,成为一种无实在对应物的景观或符号,成为一种吸纳人类精神劳动力的“吸血鬼”。

“能工巧匠”的比喻。这一比喻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完成很多精确性、常规性以及危险性的工作,比如会计师、设计师、建筑师、医生这些高收入、专家式白领工人的日常工作,它会表现得比人类智能更加具有技巧。这有助于将人们从反复无聊的机械性操作中解放出来,从而节省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这一比喻同样意味着人工智能资本化或资本化智能将这种“解放”诠释成了“替代”和“威胁”,诠释成了白领工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进而演化为白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这样的话,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根本性对抗就被工人之间的竞争所遮蔽,资本对劳动的专制力量一直在增强,但又愈益进入一种彰而不显的隐蔽状态。

“意义君主”的比喻。这一比喻首先意味着人工智能超出了机器体系的物质界限,具有营造“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功能,能够将人类精神生产力所具有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以一种清晰可见的对象性形式呈现出来,使人能够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更进一步地,这一比喻同样意味着人工智能从“生活世界”的媒介升级为“生活世界”本身,人工智能的景观和符号成为“生活世界”的自我标识,对景观和符号的追求代替了对意义的创造。与之相应,追求过程中的焦虑则代替了意义中的栖居。由此来看,与“工业君主”相类似,“意义君主”同样要求人们学会像人工智能的运转法则一样思考,去适应人工智能资本

化所带来的瞬时性、符号性以及超现实性。

综上所述,在资本逻辑的范围内,人类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自动化体系反过来反对自身,成为自身的坟墓,成为“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成为资本吸纳人类劳动力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存储器,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动力和源泉。与机器体系的资本化不同,人工智能的资本化能够塑造出一个虚幻的“意义世界”,促使资本权力获得新一轮的整合与转型,进而加剧了资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监控,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生活等等各个方面,无一不处在资本权力的支配范围之内。这无疑再一次证明,生产力的大发展助推人类超越“必然王国”而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使人类越来越趋近于“自由奇点”,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成为“人类‘自由奇点’来临有待克服的‘制度瓶颈’。”<sup>[11]</sup>

## 二、精神物化:智能化资本的权力范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指出了资本权力具有谋求社会一体化的普遍性趋势。其一,非劳动时间的物化趋势。“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从事这种变便宜的商品的生产的劳动时间。”<sup>[12]</sup>其二,自由时间的填充趋势。“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sup>[13]</sup>实际上,这两大趋势的实现程度与资本权力的表现形态相应。如果说机器体系对人类体力劳动力的支配主要表现为肉体规训,那么,智能化资本对人类精神生产力的支配则主要表现为精神物化,其发生场所已然蔓延至特定的时空范围——工厂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智能化资本时代,工厂从社会有机体中“脱嵌”出来,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基本原则。从劳动时间到非劳动时间,从生产活动到消费活动,从物质活动到精神活动,整个社会被建构成了一个“工厂社会”。

在机器体系时代,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让工人学会如何操作机器,而在于将他们约束为全职工人,“在于训练人们,以使他们放弃散漫的工作习惯并使他们自身认同复杂自动机那不变的规则性”<sup>[14]</sup>。为此,资本家主要采取的是劳动纪律。作为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纪律的目标在于通过“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sup>[15]</sup>,进而建立一种顺从与有用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纪律在其本质上是一种“驯顺—功利关系”。作为权力的微观运作,这些劳动纪律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植入工人的生产过程中,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以及“在什么时候做”方面,都作出了细致入微的规定。因此,这种劳动纪律,更贴近于人类身体的意义,可以被称为肉体规训。

然而,肉体规训具有三个方面的不足。其一,它更多地依靠的是外在的规章制度,比如作息表、操作规程、甚至是国家立法。因此,肉体的规训并不等同于精神的认同,工人依然不能完全与机器体系保持一致。其二,肉体规训更多地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工厂内开展,工厂之外的广大的社会空间依然是资本权力无法直接接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制约着资本权力社会一体化的实现。其三,肉体规训的负面后果非常明显,往往突破了工人自身肉体的自然界限以及道德的社会界限,使资本的文明总是伴随着工人的野蛮,资本的增殖总是以工人的萎缩为代价。很显然,这是一种极其不可持续的资本增殖之路。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资本权力的转型开辟了新道路,它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剩余价值的积累变得更具灵活性,使其可以超出特定的时空界限。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化资本权力在表象上并不具有强制性的暴力特征,而是披上了一件开放和包容的文明外衣,为工人提供了极具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更加关注工人的社会性发展。与蓝领工人相比,高收入、专家式的白领工人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遵守某种作息时间表,也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

间。这样一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权力普遍性趋势及其对人类劳动力的吸纳呈现出新的外观。

首先,就非劳动时间的物化趋势来看,智能化资本使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具有内在同一性,使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所具有内在同一性,它们之间的物理界限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这彰显出资本权力强大的建构性;另一方面,这瓦解了工人联合的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诚如奈格里所言,非物质劳动大有取代物质劳动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以智识、图像、共同性、奇异性等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所谓自由时间以及非工作场所中完成的。“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sup>[16]</sup>无论是机器体系时代的物质劳动,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非物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它们都是具体劳动的某种表现形式,都是可以在商品市场中被资本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从根本上说,非物质劳动同样受到抽象劳动之同一性原则的支配。更进一步来说,与非物质劳动成果所具有的“奇异性”“个别性”相应,资本权力的抽象同一性与普遍性趋势得到了有力的巩固与加强,其强大的建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信息茧房”效应、“电子圆形监狱”效应、“算法决定论”等等,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进而将深度异化人们的决策、思考,进而将其商品化。正如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生命就不再是一场决策大戏了”<sup>[17]</sup>。

如果说机器体系将工人劳动“去技能化”,使其统一地变成自己的“人手”,那么,人工智能则将工人劳动“再技能化”,使工人区分为不同种类、不同等级,如广告创意与程序员、熟练工与不熟练工等,而具有劳动技能的工人基本上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种种类划分和等级区分由

于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同一化而侵入整个社会生活,打破了机器体系中工人同质化的历史趋势。这就意味着,将工人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将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消解了阶级革命的宏大逻辑。对于作为“诸众”的单个工人,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自由时间建构为劳动时间。

其次,就自由时间的填充趋势来看,智能化资本不断制造“历史形成的需要”,将仿真的景观和虚拟的符号塞进工人的消费活动中,从而制造了自由解放的幻象,使工人逐渐变成消费性机器,进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求。

马克思将“需要”区分为“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自然的需要”就是维持生命机体正常运转的基本需要,是每一个生命体无法逾越的本能性需要。“历史形成的需要”已经超越了生命的基本需要,作为资本制造的结果,其实质在于欲望的膨胀。在人工智能时代,“历史形成的需要”越来越脱离具体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变成仿真的景观和虚拟的符号。在仿真的景观社会之中,工人消费的是被大众媒介所建构出的景象价值,消费过程是被景象制造的伪需要的满足。在居伊·德波看来,“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sup>[18]</sup>。资本正是通过控制大众媒介,进而控制商品形象的生成与转换,从而达到控制消费过程以及操纵社会生活的目的。而在工人看来,被媒介所展示的景观引导着社会风尚,表征着个性自我。由此,工人的消费活动被大众媒介所左右,被仿真景观所填充,继而被“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权力”所俘获,逐渐丧失表达主体诉求的意愿以及对本真生活的渴求。而对这种景观拜物教的反抗,针对的也只是仿真性的景观,尚未直击到景观产生的物质根源和形成机制。因此,这种反抗经由大众媒介的中介,最终被同一化为景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一种另类的消费活动。

更进一步地,在虚拟的符号社会之中,工人消费的不再是大众媒介所建构出的景观,而是作为景观之展示形式的大众媒介本身。与景观相比,大众媒介本身则是实物缺席下虚拟符号的狂欢,它作为纯粹形式而逃离其有形载体的束缚。符号的意义不是来自于实物投射,而是来自于其在符号体系中的位置。因此,人们对符号的消费过程,就是在符号所构筑的物体系中谋求自身的身份与个性,最终实现“自我解放”。在鲍德里亚看来,身体作为消费的载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与自身无关的符号性意义,“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sup>[19]</sup>。因此,人们不是主动进入而是被动陷入符号体系之中,其所营造的解放氛围只是资本规划的产物。“一切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sup>[20]</sup>

实际上,在人工智能时代,非劳动时间的物化与自由时间的填充是一体化的,二者共同统摄于精神物化。也就是说,工人在自由时间内消费资本填充之物的过程,就是为资本创造非物质劳动成果的过程。在这里,最为典型意义的例证就是“算法”。通过工人的消费记录,数据平台就能够分析出工人的“奇异性”,资本以此为依据就能通过个性化的生产来建构工人的消费活动,“每当你浏览网站、看 YouTube 视频、阅读社交媒体的动态,算法都会偷偷监控你、分析你”<sup>[21]</sup>。更进一步来说,精神物化并没有取代肉体规训,而是将其“扬弃”在自身内。机器体系时代,工人为了释放肉体规训的压抑,往往采取的是破坏体力的方式,比如酗酒等;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肉体规训获得补偿的方式显得更为“健康”和“廉价”。由此可见,智能化资本既加紧了对生产力的吸纳与掠夺,又制造出自由解放的幻象,最终将整个社会生活牢牢地锚定在自己所规划好的航线上。

### 三、“无用的大众”:智能社会中的“赤裸生命”

在机器体系时代,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机器体系使得工人劳动“去技能化”,大量廉价劳动力如妇女、儿童被纳入生产活动,而成年男性工人则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sup>[22]</sup>这样的话,整个无产阶级就被分化为产业现役军与产业后备军,二者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过度劳动”,后者“陷于半赤贫或赤贫状态”。由此,机器体系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转化成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不仅如此,为了更进一步地分化与瓦解工人的自发联合,产业后备军被进一步精简为“人才储备军”和“现代性废物”,二者的命运是明显不同的:前者被现代生产“形塑”,后者被现代生产“淘汰”。<sup>[23]</sup>由此,产业现役军与产业后备军的矛盾转化成“人才储备军”与“现代性废物”之间的矛盾。

通观无产阶级的两次分化过程,不难发现的是,无产阶级的分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是若合符节的。伴随着无产阶级分化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业化时期向后工业化时期,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在这样的时代变迁中,无产阶级的两次分化呈现出以下三个趋势。其一,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分化加强了资本对工人的专制。其二,越来越多的工人被纳入资本生产过程,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减少。其三,阶级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创伤面越来越小,甚至实现了无痛过渡。这就意味着,资本再也无需出动大规模的国家机器来镇压工人的反抗,单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能给工人制造出可以发财致富的幻觉了。

其实,产业后备军分化成“人才储备军”和“现代性废物”,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的安全性。原因在于,他们尽管自由

得一无所有,但却依然具有一种“去存在”的可能性,即通过革命理论的洗礼而解除虚假意识的禁锢,从而获得一种“成为一切”的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sup>[24]</sup>

这就意味着,对于“现代性废物”,资本必须更进一步地对其进行规训,填补其思想上的真空,将其再度纳入自己所制造的繁荣之中,让其在其中获得存在感、归属感和满足感。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及智能资本化和资本智能化的双向运动为资本权力的这一微观布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因此,如果说,在机器体系时代,“现代性废物”还有可能被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走出虚假意识的迷雾,那么,在人工智能资本化的时代,在“世界图像的时代”,“现代性废物”就直接变成了“无用的大众”,深陷虚假需要而不能自拔。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如尤瓦尔·赫拉利不无悲观地写道,人工智能的兴起催生了“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于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很有可能就算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事都不做,整个社会也有能力供养这些人,让他们活下去。然而,什么事能让他们打发时间,获得满足感?……答案之一可能是靠药物和电脑游戏。”<sup>[25]</sup>《头号玩家》勾勒出现实生活之绝望与虚拟世界之虚无之间的强烈反差。在《盗梦空间》中,总有一些人沉浸在智能技术所制造的美妙梦境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智能资本化与资本智能化的双向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权力对整个生活的规训与管控,尽可能“软化”所有将可能危及资

本增殖的不稳定因素,而重构无产阶级的内部构成则是这一权力策略的重中之重。资本与人工智能的“共谋”将“现代性废物”进一步平面化为“无用的大众”,将其表达主体诉求的意愿以及对本真生活的渴求削薄、削弱,直至瓦解。这样的话,“无用的大众”不仅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更进一步地在精神上陷入幻觉。其结果就是,他们既不被雇佣,也不被消灭,更不可能去从事危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安全的事务,就像一颗“赘瘤”外在地悬置在社会有机体之上,其大量“自由时间”被智能资本所制造的虚假需要所填充。作为“无用的大众”,他们就是如此这般地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进而丧失了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可能性,既不能创造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精神产品,进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类本性,承受着智能化资本的绝对支配和深度异化。

在一定意义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可以更好地诠释“无用的大众”的存在方式。“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核心范畴,是其生命政治学的独特标识。在他看来,“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sup>[26]</sup>这种“例外状态”是一种纳入性排除。对于“无用的大众”来说,他们表面上被纳入智能化资本所炮制的光怪陆离的“意义世界”之中,享受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福利,但是这种纳入并非是为了使其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其实质意义在于,占领其思想意识的高地,消解其斗争意志以及对另类生活方式的憧憬。因此,“无用的大众”在享受资本化智能所带来的感官愉悦之时,自己的身心却陷入了空洞与贫乏。这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人的生存境遇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没有享受到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反而自己能够创造具有革命性指向和解放性旨趣的精神财富。

而所谓的“赤裸生命”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

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和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赤裸生命”<sup>[27]</sup>。“赤裸生命”是一个生物学的生命,是非对象性的存在,并非一个社会性的生命,不是一个类存在。在马克思看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sup>[28]</sup>一方面,“无用的大众”不被资本所雇佣,就不能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不能在对象世界中直观到自己的存在,因而就成为非对象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无用的大众”被瞬息万变的虚拟图像所包围,他们只能被动地去适应虚拟图像的瞬时性、符号性以及超现实性,最多,为这个图像世界增加一重转瞬即逝的叠影。因此,“无用的大众”就像动物一样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能掌控的“流变”之中。而在这个意义上,“无用的大众”就是阿甘本“赤裸生命”的生动演绎,他们的“权利和期望”被智能化资本消解了,仅仅具有“权利与期望”的法律规定,而无其法律实质,是一个难以兑现的诺言。

经过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透视,可以说,“无用的大众”深陷资本主义社会所制造的“例外状态”之中,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彻底的“赤裸生命”。由此,“无用的大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受的深度异化便呈现出来。马克思的异化发生在雇佣劳动的语境中,是工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感受陌生化,成为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因此,是雇佣劳动制度将工人变成了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改造世界的阶级意识还是可以再度重塑的。而“无用的大众”作为一种动物性的生存状态,他不仅丧失了被雇佣的资格,而且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中,其现实生活的社会性外观仅仅是一层图像。因此,“无用的大众”很难获得改变世界的阶级意识,至多是一种改善生活的阶层意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资本化与资本智能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将整个社会座架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离心器上,

其所产生的存在论后果比“替代”高收入、专家式的白领工人更为严重,白领工人的被“替代”仅仅是我们思考人工智能问题的出发点和入口。在智能化资本的语境下,一切社会生活都被抹上了技术进步的玫瑰色,智能技术充当着意识形态的角色,而深层的权力机制被逐渐遮蔽了,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

### 注释:

[1][德]托马斯·瑞德:《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2][英]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陈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

[3][5][7][16][22][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210、88、60、495、737页。

[4][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162页。

[6][7][12][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85、276、19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10][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11]刘方喜:《文化奇点:人工智能革命的生产工艺学批判》,《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14] 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 p. 15.

[15][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5页。

[17][21][以]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2、47页。

[18][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9][20][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130页。

[23]参见王庆丰、苗翠翠:《“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4期。

[25][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3、294页。

[26][意]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27][意]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

[责任编辑:刘 鏊]